

■13、14版

深度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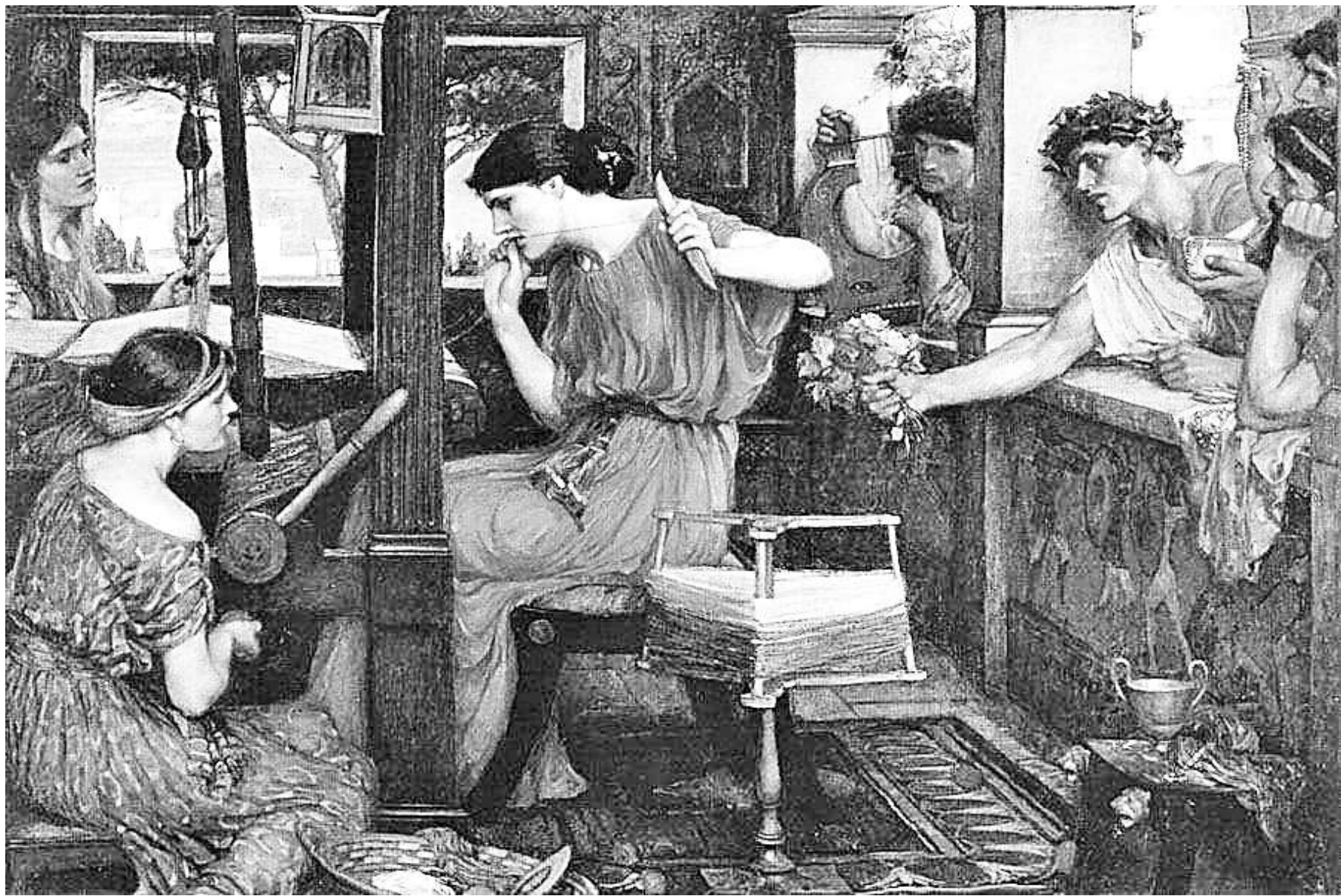
ULYSSES

JAMES JOYCE

《尤利西斯》第一版书封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不仅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还创造了一个文学的节日——布鲁姆日。每年的6月16日,全球各地的乔伊斯爱好者都会以各种方式庆祝这一特殊节日。

小说《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的漫游,首先与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归家之旅产生跨时代共鸣,又与波德莱尔笔下闲适文人流连城市街头的游逛气质相近,同时又与乔伊斯本人的自我流放以及爱尔兰人独立前夕的彷徨相互呼应,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多重意义。



约翰·威廉·沃特豪斯名画《佩涅洛佩和求婚者》

跟随布鲁姆的脚步阅读《尤利西斯》

□陈丽

I

布鲁姆日的由来

乔伊斯 1882 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市。当时的爱尔兰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乔伊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接受的是耶稣会学校的教育,曾一度考虑担任神职,1898 年进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并开始文学生涯。1904 年 6 月 16 日,时年 22 岁的乔伊斯与来自西部戈尔韦的诺拉·巴纳克尔第一次正式约会,四个月后两人离开爱尔兰前往意大利,之后便在欧洲四处侨居,以图摆脱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所指的民族、语言、宗教的“罗网”。尽管乔伊斯很少再回故乡,都柏林却在其笔下再重现,成为乔伊斯文学创作的永远主角。乔伊斯甚至告诉友人,他想要在作品中绘制完整的都柏林,“哪怕有一天这个城市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了,人们还可以依据我的书将其重建”。

II

反史诗英雄布鲁姆

《尤利西斯》开篇于 1904 年 6 月 16 日的早上 8 点钟,年轻学者斯蒂芬·迪达勒斯离开住所,去任职的男童学校上课。差不多同一时间,布鲁姆在埃克尔斯街 7 号的住宅中醒来,开始做早餐,其间妻子收到情人来信,得知他下午将登门拜访。布鲁姆饭后在花园的户外厕所解决问题,之后离开家,开始了长长一天的漫游。他或步行,或坐马车和电车,一天走了 18 英里的路程,去教堂礼拜,到澡堂洗澡,去墓地参加葬礼,拜访报社办公室,在酒吧吃午饭,顺道去国家图书馆,然后去森迪蒙特海滩散步。傍晚时分他去医院,询问一位难产的产妇,在那里遇见醉酒的女士。两人结伴同游,最终一起回到布鲁姆家。斯蒂芬喝过热可可之后清醒过来,告辞而去。布鲁姆上楼与妻子茉莉简短对话之后睡着;茉莉却难以入眠,全书以茉莉的大段意识流结束。

然而,将这本 26.5 万字的小小说简化成这么简单的情节是极其危险的。空间在小说里扮演了比时间更为重要的作用。大段的意识流铺陈,将布鲁姆漫游路上的所见所思所想松散地并置起来,大大加深了小说的容纳度,使

其成为一部包容万象、允许多层次解读的复杂文本。首先,《尤利西斯》可以被解为对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一个现代戏仿。小说在篇章结构和人物、情节的设置上,均与《奥德赛》有对应之处。《奥德赛》描写希腊神话英雄奥德修斯(拉丁语中即“尤利西斯”)的归家之旅。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屡建奇功,战争结束后率领同伴返乡,战胜独眼巨人、海妖塞壬、魔女喀耳刻等,历时 10 年成功返回家乡伊塔卡岛,杀死纠缠他妻子佩涅洛佩的求婚者,阖家团圆。布鲁姆一天的流浪浓缩地复现了奥德修斯 10 年的艰难历程,一样地有家难回,又一样地渴望回家。失家与回家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失家与归家的现代寓言。

然而,布鲁姆作为奥德修斯的对应人物,却十分颠覆读者的阅读期待。他并非英雄,而是个琐碎、怯懦的普通人。奥德修斯杀死了所有纠缠妻子的求婚者,布鲁姆却明知妻子与情人幽会,还故意在外流连以免撞破。奥德修斯的威名来自战争和征服,而布鲁姆的日子却充满了吃喝拉撒的琐碎细节。

然而,布鲁姆作为奥德修斯的对应人物,却十分颠覆读者的阅读期待。他并非英雄,而是个琐碎、怯懦的普通人。奥德修斯杀死了所有纠缠妻子的求婚者,布鲁姆却明知妻子与情人幽会,还故意在外流连以免撞破。奥德修斯的威名来自战争和征服,而布鲁姆的日子却充满了吃喝拉撒的琐碎细节。

小说对这些最寻常不过的生活细节,例如布鲁姆早餐后如厕的过程有大段的详细描述,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这些涉及隐私的话题以往被认为过于粗俗,难登大雅之堂,因而长期被排斥在文学素材之外。乔伊斯却让它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小说文本中。许多皇朝为“尤利西斯”的归家之旅。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屡建奇功,战争结束后率领同伴返乡,战胜独眼巨人、海妖塞壬、魔女喀耳刻等,历时 10 年成功返回家乡伊塔卡岛,杀死纠缠他妻子佩涅洛佩的求婚者,阖家团圆。布鲁姆一天的流浪浓缩地复现了奥德修斯 10 年的艰难历程,一样地有家难回,又一样地渴望回家。失家与回家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失家与归家的现代寓言。

III

都市漫游者布鲁姆

都市漫游者,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文化特征,最早出现在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巴黎在 19 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从中心世纪城市向现代都市的脱胎换骨。在波德莱尔的笔下,艺术家化身都市漫游者,以旁观者的姿态流连于都市街头,跻身人群中东张西望,体验和审视都市现代性与商品化的召唤与诱惑,同时又与人群保持审美距离。这种距离感使得艺术家能够摆脱商品的麻醉与奴役,以置身事外的清醒态度来挖掘各种商品背后的深层意义。波德莱尔所代表的是批判现代性的文人所要张扬的美学和哲学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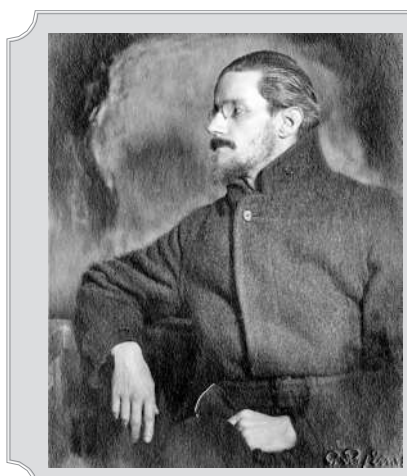
布鲁姆所在的 20 世纪初的都柏林当然比不上巴黎繁华,它是爱尔兰岛上的最大城市,是各种消费品、奢侈品登陆爱尔兰的桥头堡。布鲁姆的广告推销员身份使得他与商品消费和现代城市生活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的漫游过程中,广告时常常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成为理解都柏林的现代性风景的一把钥匙,也使得单调沉闷的日常生活具有了一定的商业艺术气息。布鲁姆眼中的都柏林并不是只有天主教堂、殖民建筑、民族主义、醉生梦死的贪杯者等固有形象的爱尔兰城市,他还是站在现代性门槛上,充满渴望和拜金追求的现代城市。

乔伊斯从艺术形式上突显了这一现代性。他对布鲁姆的漫游更多地致力于路线的刻画,准确地给出了地名,却没有像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样进行细致的环境描写。空间似乎被简化为一个一个地点,使得人物的行走路线更加突出。随着叙事在第三人称叙述和布鲁姆的内心独白之间来回跳跃,读者很容易感受到,布鲁姆对于他的行走路线颇为心不在焉。而这一点又极易得到读者的理解: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布鲁姆不需要对他已经极其熟悉的街景和路标投入过多的关注。

这种空间写作技巧产生了一种虚构的归属感或排他感,对都柏林街头景观的熟悉程度成为区分本地人与游客、内部人与外来者的标准。乔伊斯关注的并不是初来乍到的外来游客的旅游经验,而是

生活在都柏林的本地居民的都市体验。这一点又使得布鲁姆与波德莱尔的都市漫游者产生联系。波德莱尔关注的也是作为城市内部人的艺术家的情感体验。他不是作为游客来欣赏街景,而是作为内部人,在熟悉的场景中寻找艺术的“震惊”体验。在十四行诗《给一位擦肩而过的妇女》中,波德莱尔描述了诗人在街头漫步时与人群中擦肩而过的一位妇女瞬间产生的爱情。这种惊鸿一瞥的爱情正是表达了熟悉场景中的片刻“震惊”体验对现代人的心理影响,而这一点又极易得到读者的理解: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布鲁姆不需要对他已经极其熟悉的街景和路标投入过多的关注。

无独有偶,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的闲逛,同样刻画了一个内部人在熟悉场景中寻找瞬间的震惊体验。在《尤利西斯》第五章中,布鲁姆与麦科伊偶遇后站在路边寒暄,马路对面有一对男女正离开饭店准备登上马车。布鲁姆一心三用,口头与麦科伊寒暄,心里对他的言行默默评论,同时还细细打量对面的那位女士。他对那位女士的观察与波德莱尔的《给一位擦肩而过的妇女》一诗颇有精神相通之处。两位观察者都注意到大量的外貌细节,用五官的官能感受来呈现呈现城市传达给个人的转瞬即逝的震惊感。然而更令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还是一种精神上的距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分裂感,观察者并不渴求与被观察



詹姆斯·乔伊斯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IV

边缘爱尔兰人布鲁姆

布鲁姆的民族性也是形成其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布鲁姆是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但他的民族性并不稳固。他的父亲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母亲是爱尔兰当地人。因为这种混血关系,布鲁姆常常被称为“犹太人”,而不是“爱尔兰人”。第十二章中,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市民”对布鲁姆猛烈抨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布鲁姆的犹太身份也不典型,除了父亲的犹太血统之外,他与当地的犹太社团没有任何联系。换言之,他被夹在爱尔兰人和犹太人这两个身份之间,是个夹缝状态的边缘人。布鲁姆的漫游,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边缘人寻找他的身份和社会定位的过程。

乔伊斯最早于 1906 年谈到创作《尤利西斯》的想法,一开始他想设计为一个短篇小说,后来逐渐扩充。该书先于 1918 年至 1920 年间在美国期刊《小评论》上连载,随后于 1922 年在巴黎出版全书。此时的爱尔兰正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尤其是在政治方面。1916 年复活节起义爆发,宣布爱尔兰共和国从英国独立,虽然起义只持续数天,但之后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进程势不可挡,并最终发展为 1919—1921 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布鲁姆对自己爱尔兰身份的追寻与爱尔兰人独立前夕对于民族身份的集体彷徨紧密相连,也折射出乔伊斯在欧洲大陆自我流放期间对自身身份的思考。布鲁姆成为民族时代精神的一个代表人物。

在波德莱尔的笔下,漫游者是衣食无忧的有闲文人,然而布鲁姆却没有那种波德莱尔式的闲适与自主。他身陷 20 世纪初爱尔兰的社会文化矛盾之中,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多重压力的压迫与监视,看不清自己的真实面貌与处境,陷入一种乔伊斯所称的肉体与精神的麻痹状态。布鲁姆是一个在各种意义上都被边缘化的爱尔兰人:他不是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也不是正牌的天主教徒,不会说爱尔兰语,不酗酒,甚至也不是男子气十足的大丈夫,然而他与爱尔兰的联系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乔伊斯用这个完全不符合爱尔兰人自我想象的爱尔兰人充当民族精神的审视者,他用冷静超然的观察之眼隔着一段距离审视都柏林的城市与文化,在殖民者的地图上又重复上了一幅爱尔兰人自己的家园地图。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被深层异化的布鲁姆无所事事地游逛在都柏林,用一种疏远的、整体来说非殖民化的视角来打量都柏林这个殖民城市。在布鲁姆的漫游中,都柏林象征帝国权力的地标性建筑不断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同时又又被各种自由联想和并置的图景不动声色地瓦解权威。例如,小说第七章开篇便是在象征英帝国武力征服的纳尔逊纪念碑附近,然而该小节的题目却叫作“希勃尼亚首都中心”。希勃尼亚即爱尔兰的拉丁文古称,小标题对这个前殖民时代的旧称的强调,与纳尔逊纪念碑的在场形成强烈反差,既嘲讽了这一“希勃尼亚首都”的有名无实,又瓦解了纳尔逊纪念碑的稳固在场。权力/无权、殖民/被殖民、征服/独立的对立,通过双面并置的文本再现展示出来,既点明了殖民权力的压迫性在场,也提示了解构和颠覆的可能。而这种充满张力和变化的城市图景,才是乔伊斯希望通过其绘图之笔保留下来的真实都柏林。

布鲁姆用水的意象——“新鲜冰凉、永恒不变而又不断变化的水”来表达他对于身份的诉求。水既与流动的生命相合,也形象地喻示了他眼中每每刻刻都在变化的都柏林风景和生活空间,在他看来具有“普遍性”“民主的平等性”和“自身求平的本质”等特点。布鲁姆超越了他作为匈牙利人、犹太人或者爱尔兰人的一狭隘身份的诉求,既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又兼容并蓄。乔伊斯以此回应以“公民”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对纯粹爱尔兰人的诉求,认可了民族性本身就在多元杂糅中。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爱尔兰研究中心副主任)



扫描二维码,提前阅读国际文化微信公众号「国际范儿」。